

华莱坞电影研究丛书 主编◎邵培仁

中国电影业的演进路径与 话语建构：1949—1992 基于政策分析的视角

Path and Discourse of China's Filming Industry
1949—1992—A Policy Analysis

刘阳◎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中国电影业的演进路径与 话语建构：1949—1992 基于政策分析的视角

Path and Discourse of China's Filming Industry
1949–1992—A Policy Analysis

刘阳◎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电影业的演进路径与话语建构：基于政策分析的视角：1949～1992/刘阳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12

ISBN 978-7-308-13928-1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电影业—政策分析—中国—1949～1992 IV. ①J99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28737 号

中国电影业的演进路径与话语建构(1949—1992)

——基于政策分析的视角

刘 阳 著

责任编辑 徐 婵

文字编辑 姜井勇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225 千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3928-1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0571) 88925591；<http://zjdxcbs.tmall.com>

华莱坞电影研究的新视界

——《华莱坞电影研究丛书》总序

—

瑞秋·菲尔德(Rachel Field)说：“你无法解释好莱坞(Hollywood)，世界上没有这样一个地方。”好莱坞作为美国电影业的诞生地和闻名全球的电影城，位于加利福尼亚州西南部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市的西北部。好莱坞并非一个行政区域，也没有自己的市政部门，但有一个指定的官员担任所谓的“荣誉市长”，以适应举办各种电影仪式的需要。

同样，你也无法界定华莱坞(Huallywood)，地球上也没这个具体的地方，尽管有不少公司试图打造这样的地方。经过香港地区电影界的不懈努力，香港地区曾创下过电影总产值超越印度宝莱坞位居世界第二位的佳绩，赢得“华语梦工场”、“东方好莱坞”的美誉。

随后崛起的横店影视城位于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建有秦王宫、明清宫、清明上河图等 28 个跨越几千年历史时空、汇聚南北地域特色的大型实景基地和两座超大型的现代化摄影棚，是世界上最大的户外电影制作机构群，中国唯一的“国家级影视产业实验区”，也被认为是具有地标意义的“华莱坞”。

“中国坞”(Chinawood)是印度媒体于 2011 年 12 月底用来形容中国电影产业的新概念。可是过了不到五个月，七星娱乐集团即宣布投资 80 亿人民币，在天津滨海新区建设占地面积达 80 万平方米的环球影视服务总部基地——“中国坞”，意在为中国和美国电影业之间的合作打造全方位的高端合作服务平台，提供电影融资、制作服务、全球发行与营销三大服务。

继万达集团以 26 亿美元收购了美国第二大院线 AMC 成为全球最大院线之后，万达又放出豪言，要拿出 50 亿美元在海外进行一系列大并购。同时宣布，斥资 82 亿美元在青岛打造全球最大规模的影视产业园“东方影都”，包括主题公园、电影博物馆、蜡像馆、水下舞台和电影制片厂以及 20 个工作室，决心要

把集团文化板块业务的年收入做到131亿美元。

在中国,试图打造这样一个具体的华莱坞或中国好莱坞的公司还在不断涌现,但最终的“华莱坞”不会是一个固定的地方或区域,而是一个概念、符号和一种精神和文化。

—

目前,好莱坞现象正在发酵,呈现出迅速蔓延之势。除了印度宝莱坞(Bollywood)、尼日利亚瑙莱坞(Nollywood),现在又有新西兰维莱坞(Wellywood)、韩国韩莱坞(Hanllywood)等概念、口号和行动。在中国,上海学者则提出申莱坞(Sengllywood)倡议,北京、广州、浙江等地多家企业几乎同时争先恐后打造海莱坞(Haillywood)影视基地。预计在十年内,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影生产和消费市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学者已经敏锐地针对好莱坞与华莱坞跨国影视合作生产的现状和趋势,适时提出了跨莱坞(Trolleywood)影视生产经营的理念。

同如火如荼、热火朝天的中国电影业界相比,中国电影理论界显得有点滞后和冷漠,身份也有点尴尬。华莱坞概念的提出、界定、深化和弘扬,不仅可以激励全球华人、华夏子女积极投身华莱坞影视事业,而且可以引导电影学界将眼光转向一个更加久远、广阔、遍布全球的华语电影生产与传播领域。如果说,华莱坞电影产业的发展繁荣是对大中华地区整体力量崛起的自然回应,那么华莱坞电影理论研究也必须对华莱坞电影产业的历史、现状和趋势给出自己的答案和阐述。在全球性电影竞争的格局中,开拓和扩展人们认识和理解华莱坞电影与世界文化互动互助、共进共演的路径和视野。

基于对华莱坞电影研究的历史反思、现实考量和未来前瞻,我认为,华莱坞就是华人、华语、华事、华史、华地之电影,即它以华为电影生产的主体,以华语为基本的电影语言,以华事为主要的电影题材,以华史为重要的电影资源,以华地(包括中国国内和国外的华人集聚区)为电影的生产空间和生成环境。换言之,华莱坞既是物质层面上的具体性的空间、地方和电影媒介、电影产业,也是精神层面上的抽象性的符号、历史、文化和愿景。应该说,这种定义和阐释,既可突破过去华语电影研究的语言束缚,也可打破以往中国电影研究的地域局限,从而可以在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和世界华语电影的基础上整合力量、集中资源、开辟更加广阔的未来。

三

世界电影正在重新洗牌,好莱坞一家独大的传统格局即将终结,包含宝莱坞、瑞莱坞、维莱坞、华莱坞等的多极电影世界的态势已经形成。好莱坞“世界娱乐之都”的桂冠已经摇摇欲坠,一方面美国电影生产地点的分布范围不再局限于好莱坞一隅,另一方面世界电影生产者逃离好莱坞的步伐也越来越快。美国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已在天津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投资3D影视项目。美国梦工厂则在上海投资3.5亿美元建造了一家动画工作室。目前,全球都在争抢好莱坞资源,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家纷纷提供比好莱坞更优惠的补贴政策。好莱坞所在地洛杉矶市市长埃里克·加切蒂已经宣布该市进入“紧急状态”,发誓“要像守卫骨头的狗那样”夺回“出逃的影视制作”公司,决不让洛杉矶遭受像底特律因汽车业衰落而受到的那种经济重创。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华莱坞电影发力正当其时,圆梦适得其势。勤劳、勇敢、聪明的中国人既然能在第一、第二产业创造辉煌、称雄世界,也一定能在第三产业特别是电影产业赢得尊严和荣耀。2013年,“好莱虎”遇到了“武二哥”,中国电影总票房为217.69亿元,较上年170.73亿元,同比增长27.51%。其中国产片票房为127.67亿元,相比2012年的82.73亿元,同比增长54.32%,有33部国产片票房过亿元。2013年,中国新增银幕5077块,总量达到了18195块。中国电影市场规模正在迅速扩大。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调查机构的统计,预计到2020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将达到128亿美元,有望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

因此,作为目前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华莱坞电影不仅拥有全世界不容忽视的飞速发展的丰富资源,而且拥有改变世界电影格局、推进文化输出、重塑国家形象的巨大力量。当下,全世界都正在见证着一个梦想的、想象的、勾画中的、行动着的和奔跑着的动态性华莱坞,试图对她作任何定格式的描述和分析都与瞬息万变的客观事实不相符。

四

华莱坞不要忌妒好莱坞,而要以好莱坞为参照的“想象”,敬重好莱坞、学习好莱坞。这既是尊重客观事实,也是华莱坞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和文化自强的

具体表现。与狼共舞,就得是狼。宝莱坞和瑞莱坞已经成为打造民族电影风格、创新民族电影“想象”的典范。华莱坞电影业界和学界必须奋起直追,既要十分清楚自身的文化基因、历史传统的来龙去脉、优势特色,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和荣耀感,又要十分明白中华文化包括华莱坞电影生存、发展的现实基础和未来走向,在传播全球化和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下不断增强华莱坞电影的创新意识和自主能力,在顺应世界文化潮流的进程中持续巩固自主地位、提高竞争能力。在虚心学习好莱坞电影技巧的同时,努力用好莱坞的技巧讲好华莱坞的故事。

当然,华莱坞也要把好莱坞作为一个追赶和超越的目标,否则是没有出息的。华莱坞作为一面文化旗帜,不仅在特定社会环境或社会规范下能被广泛接受与认可,而且具有很强的涵盖性、统合性、包容性和辨识性,符合华人社会的希望与期待。它能产生巨大的号召力和向心力,让分散、游离、漂浮的力量再度融入和聚合,从而可以将已经消沉的智慧和无望的边缘状态再次激活和升华,让华人社会形成强大的归属感、凝聚力和身份认同,进而有可能释放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产生巨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甚至有可能形成一种全球性的电影话语权。

华莱坞有十分优越的基础和条件。相同的中华文化传统,共通的华语传播通路,共同的人类基因遗传,相似的中华历史认同,以及可以共同挖掘、开发、传扬的物质或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中华文学、中华艺术、中华武术、中华美食、中华医药、中华服饰、中华书画、中华音乐、中华歌舞等,都会自然而然地汇聚、融合、生成和升华,成为华莱坞电影在文化、美学、资金、人才等层面开启合作和进行国际传播的珍贵宝藏和强大动力。

创新是电影的灵魂,内容是电影的命根。一部世界电影史,就是一部电影创新史。电影创新是电影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和电影传播的最高境界。没有基于中华五千年历史和当代现实以及切合观众真实需求的创新性的电影内容,就失去了华莱坞电影生存与发展的基础。许多电影制片人和导演凭经验办事,靠拍脑袋决策,不重视市场调查、前期策划和创意写作,违背当今电影生产的趋势和规律,结果常以失败告终。相反,一些重视创意策划的新锐电影公司,凭借内容优势和电影叙事、艺术表达的国际水准,加上年轻的明星阵容,在投入不多的情况下,没有炫耀科技,也没有玩弄技巧,即获得巨大收益,产生良好声誉。因此,内容至上,应该成为华莱坞追赶和超越好莱坞不变的宗旨。

华莱坞作为国家的面孔,体现中华文明的“精、气、神”。我们必须积极探讨在制片、发行和播映方面一整套同世界接轨的运营方略和模式,积极向世界传播华莱坞。特别是在电影全球推广营销方面,华莱坞必须以最大诚意向好莱坞学习和致敬。为什么好莱坞会成为国际舆论和社会时尚的风向标,成为影响世界文化、经济甚至政治的重要的文化现象?这与其强大的市场推广和整合营销能力不无关系。先影院放映再社会推广,先国内播映再全球发行,先纯电影营销再后电影拓展,按部就班、有序有节地进行立体的全方位的整合营销传播,是好莱坞电影的基本运营模式。好莱坞电影宣传营销费用往往占到总经费的25%左右。它们意识到,没有强有力的宣传推广,要观众摆脱电视的诱惑自觉地去电影院看电影是很难的。

在全球电影多极格局中,华莱坞电影融合和合作的进程在加快,整体力量开始显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华莱坞电影先后经历了由间接融合到直接融合、由初步合作到全面合作再到深度合作等多个阶段。现在已经进入华莱坞后融合时代,一种由低到高、由下到上、由简单到复杂排列的物理性融合、化学性融合和生物性融合的金字塔融合模型即将形成,一种融入业界期待、愿景和学界思考、理想,具有“高级生命体”特征的最高融合境界已经晨光微现。

华莱坞试图追赶和超越好莱坞,并不是一定要取代它的位置以称霸电影世界,而是要与世界各国电影界共同努力不断丰富世界电影艺术,着力建设一个文化多元化的世界。华莱坞不应该也不可能以一种解放了被压迫的状态,再度复制一个她曾经深受其害的单极独大的单向度的电影世界。在全球化时代,作为长期遭受好莱坞电影霸权文化的掠夺、挤压的华莱坞,文化觉醒后的电影蓝图应该是在积极吸纳和借鉴好莱坞的先进理念、管理智慧和经营谋略,在合理继承和革新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探寻华莱坞同世界接轨的共通价值、理念和独有模型、特色,通过电影的形式促进世界文化的多极化和世界电影的繁荣与发展,使华莱坞电影成为与其母体的空间结构、文化传统、综合实力、文化理想相适应的世界电影舞台上闪亮的明珠,世界多元文化的重要一极。

五

2013年的金秋时节,我们在杭州成功举办了浙江大学“国际传播视野中的华莱坞电影”学术研讨会,华莱坞电影这一话题得到学界、业界和期刊界的广泛关注和支持,相继有50余篇会议论文在各类期刊上发表。2014年11月,浙江

大学传播研究所和浙江省重点创新团队——浙江省(浙江大学)国际影视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再次在杭州联合主办浙江大学“媒介生态学视野中的华莱坞电影”学术研讨会。同时,团结国内外电影研究者推出《华莱坞电影研究丛书》。意在用事实证明,“华莱坞”不会只是一个符号、一句口号,而是一个崭新的电影研究视界、方向和热点,伴随着电影学界持续稳定的关注、思考和研讨,还必将转化为电影业界的一种群体智慧、集体行动和整体突围。“华莱坞”也不会只停留在当下的想象和期待之中,还必将伴随着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矫健身姿和坚定脚步,成为展现中华文化魅力的星光大道和璀璨舞台,成为创造世界文化繁荣、共享人类文明和谐的全新天地和生态绿洲。

是为序。

邵培仁

2014年8月26日于杭州市沿山河畔寓所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研究概述	(1)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总结	(1)
二、相关研究的主要内容与主要观点	(4)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6)
四、相关研究的创新之处	(8)
五、相关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8)
第二节 电影政策影响因素辨析	(9)
一、传统文化心态	(10)
二、社会转型	(13)
三、市场经济	(14)
四、法治理念	(15)
五、国际时政	(17)
第三节 华莱坞电影学的启示	(19)
一、中国电影产业化现状研究	(19)

二、华莱坞内涵的深度解读	(24)
三、电影工业的政策导向	(30)
第二章 一体化的电影管理体制：1949—1966	(34)
第一节 政治至上的电影政策	(34)
一、鲜明的政治性	(35)
二、严密的计划性	(37)
三、不稳定性	(39)
第二节 一体化的电影管理体制	(43)
一、所有制改造	(43)
二、制片管理制度	(45)
三、审查制度	(49)
四、发行放映制度	(53)
五、人才培养模式	(55)
第三节 一元化的电影形态	(59)
一、革命正剧为主的题材规划	(60)
二、英雄人物的着意刻画	(62)
三、戏剧式电影的叙事/影像	(64)
第三章 停滞的电影业：1966—1976	(69)
第一节 “文革”中的电影业	(69)
一、间断的电影生产	(69)
二、陷入窘境的电影经营业	(74)
第二节 政治路线的宣传品	(76)
一、“样板戏”的风行	(76)
二、“三突出”原则的广泛应用	(78)

第四章 电影业改革的萌动：1976—1984	(82)
第一节 整饬电影业	(82)
一、复审“毒草”影片	(83)
二、新中国成立30周年题材规划	(85)
三、清算反动罪行与重立行业新规	(87)
第二节 重建电影生产和管理秩序	(89)
一、电影制片管理改革	(90)
二、发行放映体制改革	(93)
第三节 文化反思语境中的新时期电影创作	(96)
一、批判、反思的社会语境	(97)
二、伤痕电影、第四代的登场及现实主义题材电影	(101)
第五章 电影业的二度定位：1984—1992	(118)
第一节 电影业改革的局部试水	(118)
一、电影事业单位的企业化管理	(119)
二、审查制度调整	(123)
三、发行放映管理制度的变动	(126)
第二节 艺术坚守与创作的分化	(128)
一、娱乐片的昙花一现	(128)
二、主旋律电影	(132)
三、第五代的横空出世	(135)
四、“王朔电影”	(139)
第六章 反思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电影业	(142)
第一节 电影业演进的路径研究：1949—1992	(142)
一、未能及时转变思想观念	(144)

二、部分电影企业的市场敏感度较弱	(145)
三、体制不顺,利益分配不均	(145)
第二节 政治话语、精英意识与大众文化的交错	(146)
附录	(149)
参考文献	(174)
索引	(201)
后记	(203)

第一章 絮 论

第一节 研究概述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总结

近年来，“华语电影”、“重写电影史”和“文化研究”已成为中国电影研究领域的三大热门话题。特别是“重写电影史”，由于研究者的研究视点、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以及研究的预期目标各不相同，切入点各异，结论也见仁见智，于是便形成了众声喧哗的学术氛围。借助于“重写电影史”的学术研究背景，这里仅对与本书有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作一综述考察，以廓清以往研究发展脉络，探索未来研究进路。

20世纪40年代，法国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在《世界电影史》中对电影史研究的“资料”、“方法”与“问题”提出了较为全面深刻的见解。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迈克尔·伊桑伯格、万斯·凯普利、杰拉尔德·迈斯特等为代表的电影学者，分别对“元电影史”、“电影史特性”、“电影史与电影资料”、“电影史与电影史著作”等各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细致深入且颇有价值的分析和阐述。与此同时，《电影史问题》、《抵制影像：电影与历史论文集》、《早期电影：空间、框架、叙事》、《橱窗观看：电影与后现代状况》、《电影与现代生活的发明》等相关著

作,更是对电影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以及电影史研究的学科问题进行了集中而广泛的交流与对话(李道新,2008)。

相对于国外的电影史研究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电影史研究起步较晚,并且因为改革开放所引起的社会转型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研究态势和学术趋向。早期的中国电影史研究著作,如谷剑尘的《中国电影发达史》(1934)、郑君里的《现代中国电影史略》(1936),具有贯穿始终的电影观念和在当时看来颇有进步意义的史学观,极具史料价值(李少白,2005)。新中国成立后,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1963)一书中所给出的史学观、研究方法和丰富的电影资料,对其后的中国电影史研究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改革开放后的1995年至2005年间,中国电影史研究掀起了一股高潮,主要在以下几个框架中展开:第一是“发展史观”,这是一种把握历史发展的线性轨迹、强调历史形态的因果链环、抽剥历史内核的既定规律的研究框架。它以历史必然性的先在模式和以时间为唯一参照系的分段、分期的历史表述方式,来描述历史向其终端的趋近过程,并对此进行价值判断和评估,是我们长期以来所采取的电影史研究的基本框架。第二是“精英史观”,即把电影研究框定在上层文化精英的电影活动领域,漠视普通电影观众和一般电影从业人员群体的相关历史活动领域。第三是“本体史观”,即把电影史复杂的研究对象纯化为电影艺术本体,甚至是影像本体的不断变革的历史(陈山,2007)。

总体而言,既有的电影史研究成果在电影史观念领域彻底摆脱了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对于电影史研究模式、思路和方法等具体问题进行了观念上的辨析和学理上的阐释,呈现出多元化的开放的研究格局和较为丰富驳杂的文化系统。但是,也还存在不足:第一,在电影史观上,较多地采用宏观史学的方法对历史进行线性描述;较少地从空间角度等其他角度入手,对历史事实进行横向切割,对电影事件进行微观研究。也正是由于缺乏扎实的微观研究基础,过分强调史学观念上的创新,曾一度导致翻案史学和阐释史学的勃兴。第二,在电影史料学方面,中国电影史研究还缺乏较为完备且可供检索的资源库。第三,在电影史写作中,重复性研究成果过多,没有形成严谨规范的治学氛围和扎实深厚的写作技艺。

同时,由于中国电影政策及法规的复杂多变性、敏感性和一定程度上的保密要求,国外学者很难获取相关的研究资料。而且,因为国情和文化背景差异,国外学界极少关注这一学术话题,相关研究亦着墨甚少。故而,国内类似的研

究成果为数不多,大致集中于以下几个议题:

一是电影政策与电影产业化发展的关系研究。一些研究者认为,政府的政策规制是推动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关键要素,在推进中国电影产业化的进程中,公共政策要围绕产业化进行多方面的调整,如电影管理观念与制度的转型、建立现代电影企业制度、强化电影产业主体的市场观念等。从完善政策建议的角度来看,研究者们提出了诸如加快《电影法》和电影分级制度的制定、加大对电影业的国家扶持力度、重点支持数字电影的发展、开发农村电影市场、拓宽电影企业的融资渠道、推动电影产业价值链的延伸等具体做法(武彩云,2005;姚志文,2006;高铖,2006;孙春生、陈振英,2008)。

二是反思电影立法。《电影管理条例》的颁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立法观念的转变,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对民营电影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推动作用,有助于电影市场的全面繁荣(刘帆,2005)。但中国电影的法制建设还存在许多盲区和误区,真正成熟、完善的电影产业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电影政策法规体系也没有完全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桎梏。从法理的角度来看,现有的规章制度限制性的规定过多,赋予市场主体的权益过少。为了创新当代电影产业法律制度,需要构建一整套相对独立完整的、具有自己特定调整对象和范围的电影法律体系,并对电影业在体制层面、经营层面、管理层面上的法律规范等加以细化。

三是探析电影政策调整的诱因。章柏青、贾磊磊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前,诱发重大电影事件和重大政策调整的因素一般都是政治事件和文化事件;改革开放后,政治因素的影响作用逐渐弱化,经济因素和电影的法制化管理因素开始不断突出。电影由过去的“人制”变为现在的“法制”,有利于电影按照自身的艺术规律和商品价值规律健康、有序地发展(章柏青、贾磊磊,2006)。

概括来看,既有的研究侧重于分析电影政策对电影产业化发展的促进作用,理性地审视了现有的电影法制建设的不足,从完善政策的角度提出了较多切实可行的建议。但也有不少需要改进之处:第一,在许多研究者的论著中,电影政策仅被当作电影文化现象或文艺思潮的背景和陪衬一笔带过,研究重点多放在电影创作策略的位移、美学风格流变或市场营销体系的建构上,忽略了政策因素在电影文化现象发生、发展和转变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一历史事实。第二,研究领域过窄,过多着眼于电影政策与电影产业的互动,对于诱发电影政策变动的诸多因素及其相互之间的辩证关系研究缺乏应有的重视,仅停留

在表层而没有向纵深开掘,问题意识不强。此外,对于新中国成立后至中国电影出现产业化发展之前,也即1949—2003年期间中国电影政策和电影形态之间的关系研究较为鲜见,缺乏系统的整理和论述。第三,现有成果多以思辨研究为主,量化分析方法的运用较为欠缺。

针对此,本书以历史发展的线性时间为参照系,以考量电影政策的嬗变轨迹为主脉络,在此基点上结合电影业的演进路径和电影话语建构的现实逻辑,研究中国从1949年至1992年间电影事业的成败得失,探讨产业化背景下中国电影的发展态势。

二、相关研究的主要内容与主要观点

(一) 主要内容

电影政策一直是直接规范新中国成立以来电影发展最为重要的因素。借助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电影政策衍变的考量,我们不仅可以分析新中国电影事业所取得的成就,而且可以分析取得这些成就的社会动机和历史倾向。因此,本书拟以电影政策的衍变为视角,考察1949年至1992年间中国电影业的演进路径和话语建构,分析其中影响电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变量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将微观的电影政策置于体制改革、文化转型、经济发展和国际时势变化的宏观空间中,并着重研究各个时期的电影政策对电影话语形态的规范、制约和促进作用。希冀通过宏观描述和微观分析,大致清晰地勾勒出这一时期我国电影业的演进路径以及相应的电影形态的衍生、成型与流变,并探究电影政策在其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电影曾经历过的重大历史时期,不仅是出于电影史建构的必要,也是为演进中的民族电影作一份纪录性的考察,进而叩问与探寻中国电影未来的发展道路。

(二) 主要观点

其一,电影政策的制定、出台与实施是一个长期的综合过程。依据既有的历史与现实,电影政策的制定要受到传统文化心态、社会转型思潮、市场经济发展、法治理念、国际时政语境等几大方面因素的影响。而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变量、民族特点、宗教信仰、传统习惯、创作自由、元政策的制定等,也是重要的影响变量。这些影响因素之间相互渗透、互为因果;电影政策的出台并非相关行